

1929——1994

老舍研究：六十五年沧桑路

石兴泽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年·济南



石兴泽,男,1954年10月生于山东省茌平县一个偏僻的小村。9岁上学,在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贫困中度过童年、少年。1976年入聊城师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参编著作4种,出版专著4种,其中,《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1978年以来发表学术文章70余篇,《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0余篇。曾获省社联、省教委和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0数次。现为聊城师院副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

自序

老舍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极其复杂的存在。其一生劳作，关涉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的许许多多方面。老舍研究也已经深入到作品和人品、外行与内思以及所关涉的许许多多方面。我试图全面地梳理和概括，以显示研究的过程和全貌，不辜负研究者的努力。但我知道，以我有限的视界和微弱的笔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我确实知道，几乎每篇文字，哪怕是很短的文字背后，都有一颗严肃认真的心，都力图求实显真，走近老舍，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见，为研究大厦增砖添瓦——不可更替的砖，不可或缺的瓦。而且他们的劳动也确实或大或小地丰富了老舍研究的内容，促进了研究深化。应该说，每一篇文章在老舍研究的学术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我本应珍视他们的努力，记录他们的劳作。但这是不可能的。不仅能力有限，篇幅有限，而且我的工作不是收集，也不是编辑，我要考察，要思索，要概括，要抽象，我要从林林总总的研究中总结六十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要藉此索寻几十年学术发展的踪迹，表达我对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发展的某些认识。我总觉得，老舍研究的路，无论坎坷还是坦途，都有它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都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学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甚至在过去几十年间，影响和制约比它自身的逻辑更有实力。因而离开外界因素只着眼于研究本身，无论纵向考察，还是横向论述，都很难做出科学的说明；同时我觉

得,学术研究,哪怕是学术之林中的一棵极小的树,也是社会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制于思想文化整体,也反映着整体思想文化,影响着整体思想文化。一个研究者就是要通过他的研究去影响学术的发展,进而影响思想文化的发展。我简化材料,注重思考,就是试图通过考察,给六十多年来的老舍研究做一个小结,并藉以管窥六十年来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侧影,奢望通过“小结”和“管窥”,丰富今天的存在,影响未来的发展。我知道自己识浅笔弱,考察本身既不能令人满意,思考也显得浮浅偏狭,“试图”种种,更难实现。但我不放弃我的努力,也不放弃一个老舍研究者的义务。

谨以这浅见的文字就教于相识或不相识的师友。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小引.....	1
第一章 良好的开端(1929——1937)	2
第二章 缓慢的伸延(1938——1949)	11
第三章 艰难的行进(1950——1966)	19
第四章 长足的发展(1977——1994)	31
一、从习惯性依附走向独立自觉的学术探讨.....	31
二、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之一).....	42
三、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之二).....	51

四、多维视界的人本研究	62
第五章 海外老舍研究简况	81
台、港的老舍研究	81
日本的老舍研究	84
前苏联的老舍研究	87
美国的老舍研究	91
其他国家的老舍研究	94
结语 前进与沉滞:文学批评影响下的老舍创作	99
附录:	
一、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表存形态及其矛盾运动 ——老舍性格心理研究之一	113
二、情感宣泄与理性制约及其对生活和创作的影响 ——老舍性格心理研究之二	171
三、近年来老舍研究论著篇目索引	203
后记	226

小 引

从1929年朱自清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发表,到笔者着手这篇述评,老舍研究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从沉稳扎实的起步,中经动荡年代的徘徊、狭窄轨道上的倾斜,再到良好的人文环境里的全方位突破,高速度发展,从追踪评点、依傍阐释到系统独立、自觉深入地研究,其间,积累了多少经验,蕴含了多少教训,有多少发人深思的启示,又有多少可歌可书的探寻!披览卷帙浩繁的研究文字,追踪几十年的历史足迹,检视研究的成就和不足,我既为它的曲折误阻而痛心,也为它的顽强发展而欣慰,既为其中某些简单武断的结论而震惊,也为那些锐意进取、大胆开掘的精神而感奋。数百万文字排列书案,面对如此辉煌的研究成果,我在欣喜之余,也倍感把握的艰难。感谢曾广灿先生、宋永毅先生,他们以高度的学科意识和学术自觉,筚路蓝缕,拨冗见著,写出《老舍研究纵览》、《五十年来的老舍研究之研究》、《世界性的“老舍热”和各民族审美方式的异同》(后两篇文章收入《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为我的述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我将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把六十五年来的研究划分四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及海外的研究状况进行粗略的评述。

第一章 良好的开端

(1929—1937)

从1929年到1937年是老舍研究历史进程的第一阶段。这期间,老舍以文学新人的形象走进研究视野,随着创作实绩的扩大,其形象越发突出,人们对他的认识,也由远及近,由浅及深,由模糊到清晰,由零散到综合——浅层面的“深”和“综合”。但在另一方面,老舍是带着真正艺术家的追求走上文坛的,在那个嘈杂的时代,注意他的也大都像他那样追求艺术完美的人,那些具有艺术慧眼和学术意识的人。因此,虽然研究刚刚开始,却很少受到干扰;而整个文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当研究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即使开篇,即使浅简,也相当可观——这阶段的老舍研究,不仅涉及许多本质性的话题,而且表现出相当可贵的学术品质。

开老舍研究之先河的是朱自清。当老舍还在遥远的异域由着自己的心性探寻文学之路的时候,当老舍的创作因远离时代话语而被冷落在时代革命的光束打不到的角落的时候,他就以史家独具的慧眼发现了老舍创作的个性异彩。老舍的第三部小说刚刚发表,他就在《中国新文学》专题课上列专章给学生讲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与此同时,还写下了被视为老舍研究第一篇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分析老舍的创作,认为在这两部作品中,有些描写过火,夸张失度,与词气浮露失之张皇的清末“谴责小说”接近;但

就性格描写而言,却与“谴责小说”的杂集话柄不同,其间的“性格扩大”正与《阿Q正传》相接近,而“严肃的悲剧收场”更显示出现代小说才有的品格。朱文还就作品的写景和结构做了分析,认为作品结构“大体是紧凑的”,写景是老舍的拿手好戏,“差不多都好”。(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署名“知白”)显然,这些分析抓住了老舍早期小说创作的特点,对缺点的批评和对优点特色的肯定都符合作品实际。正是这客观的分析和史学界定,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严谨的批评精神,为老舍研究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此后几年间老舍研究的路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铺展开来的。

老舍是在创作“进行时”走进研究者视野的。这期间,他频频地将自己的新作推到人们面前,而研究也就随着新作品的出现而不断地更换新的话题。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发表都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甚至引起讨论。时隔几十年,梳理话题的变化已不重要,下面要做的是,将这阶段的研究看作整体,就其中主要的研究课题做粗略的介绍。

关于《猫城记》的评论。《猫城记》载于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的《现代》杂志,1933年8月出版单行本。此后不久,天津《益世报》副刊就发表了署名谐庭和似的文章,予以肯定。值得称道的是,这两个作者都把《猫城记》与老舍此前的创作联系起来考察,称赞老舍创作的进步。谐庭认为《猫城记》胜过老舍以前的作品,艺术、思想都达到“成熟的地步”,它“借了想象中的猫国把我们中国现代社会挖苦得痛快淋漓,而作者始终保持一种冷肃的态度。文字的优美一如以前诸作,而内容情节之穿插较以前作品进步极多。这本小说是近年来极难得的佳构”。(《〈猫城记〉》,载天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第43期,1933年9月23日)似则认为,《猫城记》是一部“值得读的”“暴露文学”,“老舍先生用猫城的事实来描写我们人间的事实,希望不是绝望,在没有希望中存在着希望,在冷嘲热骂

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见老舍先生的苦心,和他的用心,不愧为呕血之作;”无论在“内容的充实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和以前相比,都“达到成熟火候的阶段”。(《〈猫城记〉》,天津《益世报》副刊《别墅》,1933年10月8日)观容把《猫城记》与当时“流行的所谓幽默文学”比较,称《猫城记》“到底是一个肥硕的果子”,“一本可以读的书”。(《读〈猫城记〉》,《众志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5月15日)王淑明则在肯定《猫城记》是“现代幽默文学中的白眉”的同时,着重分析作品存在的缺点,他认为,有的人物性格前后矛盾,如小蝎,前半呆笨,贪婪,自私,后半不仅表现出很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他的批判国内情状,真如老吏断狱,语语中肯。”他还特别指出,小说夸大了猫人的丑恶和猫国的黑暗,“有些以偏概全,以部分涵盖全体”,并且以为,“尤其歪曲事实的,是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一味的将它涂满了悲观的色调”。王文认为,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不清民众的力量”,是作者“无视客观的现实所得的主观见解”。(《〈猫城记〉》,《现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这些批评是尖锐的,有些也是客观的。

关于《离婚》的评论。《离婚》是老舍创作道路上一个重要的界碑。它标志着老舍小说艺术走向成熟。有眼力的评论家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迅速做出反应——1933年8月良友出版公司出版不久,就有吴联、寤羊、陈芳若、燕子、李长之、常风、李影心、赵少侯、尹雪曼、唐穆、吴伯箫等人撰文评论。论题涉及幽默风格、语言运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地域特色等内容。难能可贵的是,有的论者把《离婚》放到老舍创作道路上,在与此前作品比较中分析《离婚》的因袭与发展,超越与成就,有的论者还把《离婚》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与外国某些作家进行比较,从比较中突出《离婚》及其老舍创作的个性特色。赵少侯认为,《离婚》是一部“上乘的写实小说”,其幽默,既不是低级趣味的笑话杂集,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靠字句的安排”的技巧制造,是作者“看出了人生根本具有

的幽默，”“老老实实写下来的真正的幽默”，“这种幽默常常是令人微笑之后，继而悲苦的”。（《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载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8期，1935年9月18日）常风则认为，老舍虽然堪称“今日的一位幽默家，但他的幽默的分量远不逮讽刺”，因为读他的作品所看到的“不是幽默的含蓄而是讽刺的夸张”，但他并不否认，《离婚》这本小说，“不惟是现代小说的一本佳构，并且也是作者自己创作中第一本完美的作品”，（《论老舍的〈离婚〉》，天津《大公报》1934年9月12日）常风的评价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定。

评论者在充分肯定《离婚》的成就、特点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同时，也就许多问题提出批评。赵少侯认为小说对马克同这一人物“描写得过火”，有悖于生活，也欠艺术性；李影心则指出，老舍让老实巴交的丁二爷突然干掉做恶多端的小赵，“显示着太重的‘善恶是非’一类的道义的观念，”这是对“艺术表现的一种损害”，这种“损害”源于老舍的“理想”：黑暗的现实加重了老舍的“感伤”，“为求得理想中的慰藉，他把其中可爱的事实与人物增加了些很浓重的理想的气质；这样也曾偶然的维护了事实的完整过程，但大多数是失败了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吴联。《离婚》出版不久，他就发表书评《老舍的〈离婚〉》，其副标题是：“给读者灰色的印象。”他认为，小说与其叫《离婚》，“不如改为《少年老李之烦恼》，老李在环境挤压面前只会徒唤“没意思”，结果“缩头缩尾的跑回乡下去。……，我们实在不赞成老李的态度，也就实在不赞成作者舒舍予先生”，他说，《离婚》“除了漂亮的幽默的技巧之外，其余都不能使我们满意地接受”。（载天津《益世报》副刊《别墅》1933年11月23日）这样的批评，虽无多少可取之处，但聊备一格，足以说明审美欣赏的差异与认识的缓慢。

关于短篇小说的评论。老舍以长篇小说创作闻名于世。随着文名扩大，索稿者日多。为偿还文债，也由于其他原因，教书和创作

长篇间歇，他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出版了《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三个中短篇小说集。在单篇发表和结集出版后，敏感的批评家都曾给予热切关注，并著文评论。《黑白李》发表不久，就有人指出这是“理论和故事”并重的作品，“在技巧和意识上，都有着明显的力量”，（天津《益世报》副刊《别墅》，1934年1月21日）联系老舍的自评可见，这是敏感准确的捕捉。《樱海集》出版后，人们对它所带来的变化更是予以足够的认识。这阶段比较活跃的老舍作品评论者常风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他认为，与《赶集》相比，《樱海集》减少了幽默，“文字着实了许多，细腻了许多，”此其一；其二，《樱海集》的出版，弥补了新文学在内容和语言上与大众隔膜的缺陷，这是老舍在“新文学上的功绩”（常风认为，新文学作家大都局限在自己“狭小的社会里与个人单纯的经验中”，“不屑，而且也不能迈过他自己造成的限制，走进一个较广大的人生与经验，去接触新奇的声音与颜色”，因此，作品传达的经验与感情“和一般读者不能相容”。同时，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大众能了解的平易文字”。《樱海集》从内容到语言都接近大众，弥补了新文学的“遗憾”。这是很客观的评价。三十年代“大众化”的呼声虽然很高，但实际上都在写着“化大众”的作品；老舍虽然不曾跟着呐喊，但其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从致力于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到追求语言的“俗”“白”之美，都与大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相接近）；其三，《樱海集》虽然仍写“可怜的一群，”但与以前相比，“少了讽刺而多了同情。”这些“变动”“是好的”，它说明，老舍“已经获得成功的技巧；以它来阐明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得心应手，篇篇作品都不容妄加一点意见，”而《月牙儿》和《阳光》是最成功的两篇，“也是最能代表作者的长处与变动的文字。”常风所说的“变动”，老舍颇有自觉意识；但对“变动”的长短，却把握不准。常风则在文章中肯定地说：“我们大胆的代老舍君回答，这些变动是好的，同时，我们还期待着老舍君更大的贡献”。（《〈樱海集〉》，天津《大公

报》副刊《文艺》第16期,1935年9月27日)

《樱海集》之后,老舍创作了中篇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评论者黄照分析了作品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及其“严重的分量”以及悲喜交融的艺术风格,并从“变动”的角度分析了老舍创作的发展,认为,《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出现表明,老舍的“转变较前更透彻了。第一,文字脱离了过分北京味儿的腔调,用纯粹的白话;第二,残余在《樱海集》里的幽默诙谐气氛到此消失净尽;余如结构的简短紧凑,没有多余的穿插,人物性格行为描绘得维妙维肖,哪怕是不重要的汽车夫,厨子,或娘姨,哪怕这些人只出现一分钟说一句话,也恰如其身份口吻,诸如此类或显或隐表示作者在创作上新蕴蓄了强烈的热情和努力”(《评〈新时代的旧悲剧〉》,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第34期,1935年10月30日)《新时代的旧悲剧》收在老舍第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蛤藻集》中,小说集于1936年11月出版,因国势严峻,直到1940年才有林茨的《评〈蛤藻集〉》发表,林文分析了小说集的思想艺术特色,并对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评〈蛤藻集〉》,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11期)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李长之的老舍研究。李长之(1910—1978),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三十年代前半就读于清华大学,开始文学批评。这期间他曾就老舍的《猫城记》、《离婚》等作品做出颇有见地的分析评论,是该时期老舍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认为,《猫城记》与老舍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两大特色,“一是作者自我的表白,”他从来没像在《猫城记》中这样直率地流露自己的情绪——如国家观念、爱国思想、乐观情绪等等;二是对“中国一般的国民性”的讽刺。他当时正在着手《鲁迅批判》的写作,顺便把老舍与鲁迅做了比较,他认为,就讽刺的对象而言,老舍与鲁迅相似,但风格不同:“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他肯定《猫城记》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作者所见病相是多的,但对病源的认识及其以“人格和知识”作

为药方进行治疗却是糊涂的,小说中所写的“正面理想的英雄”只是“十分空虚而抽象的名字而已,”他还说:“说到文艺,我不承认《猫城记》是好的文艺。我觉得它是一篇通俗日报上的社论,或者更恰当点说,它不过是还算有兴味的化装讲演”(《〈猫城记〉》,《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评论《离婚》的长篇论文,涵盖了当时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离婚》的认识水平。文章共四部分。一,“论老舍的幽默”,文章一开始就说,“与其说老舍的小说以幽默见长,不如说是讽刺,更恰当地说,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为作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是讽刺的外衣”。老舍的作品,“智的(Intellectual)成份多于情绪,”他思想迅捷,观念丰富,“那不断的,拥挤的,丰盈而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供他驱遣,所以大体上他是成功的,”对作品中“不经意的错失”,他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二,“老舍讽刺的目标,”他认为是“妥协,敷衍,”是“怯懦,”这是“统一了所有的老舍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由此构成“灰色的世界,”“拆开来,是灰色人物,凑起来,是灰色社会,”在这一社会中,老舍描写了两种人:“书呆子与京油子。主旨总是书呆子被京油子征服”;三“技巧:写女人和家庭最成功。”尤其是写在家庭中处于太太地位的女人,更是老舍的长处;四,结论:老舍写离婚,写家庭,“为的是给社会上的妥协和敷衍指出一个基础”,标题“离婚”,是在“敷衍、妥协、怯懦的空气下”透露“一个复杂相的一点消息而已”。(载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此后,李长之还为老舍的《贫血集》、《火葬》等作品写了评论。值得一提的还有,1946年老舍和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李长之写了《送老舍曹禺出国》,(载《大公报》副刊《文艺》,1946年3月3日)从宏观上把这两个文学健将作了比较,充分肯定了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分析比较了他们的异同。他说:“老舍是中国现在最受欢迎的小家之一,曹禺是中国现在最受爱戴的剧作家之一”,他们都是以献身的精神把写作当作事业来从事的,老舍偏于现实,曹

禺偏于理想,“可是在偏于现实之中而时时挣扎到创造理想,和在偏于理想之中而时时企图接触到广大社会的现实上,两种倾向又有了汇合。”“就写作的进展论,曹禺的路线是在往理想的高处走,老舍在路线是往社会的大圈子之广处求”,他们“都是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却同时都有着根底上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多思,而又往往把具有这一种成份的性格给了他们的书中英雄。”这样的比较以及前面所述的评论,虽然还欠深入具体,甚至带有垦荒者的稚弱和不足,但毫无疑问,他接触到某些本质特征,为后来的研究打开了思路,拓宽了空间。

对象的存在及其方式决定着认识方式及其程度。综观这一时期的老舍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老舍的创作还处在“现在进行时”,他不断将新作呈献在人们面前,因此,研究也不断地变化“热点”,这种“追踪式”的研究,一方面使研究多停滞在作品评点、解释的层面,较少综合性的研究,即使涉及综合,也往往由局部引起而又囿于局部,如幽默问题,如比较的分析等等,都是如此;但在另一方面,随着讨论话题的不断更新,人们对老舍的认识也越发充分——变化深化着认识,也影响着认识深化。其次,老舍没有派系,是以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关注他的也大都是不存派别偏见的纯正学者,他们从艺术或学术的角度认识作家作品,思想一般没有多少条条框框,既很少受到艺术和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也很少掺杂因党派或宗派所滋生的思想感情的因素,既不像后来那样因老舍的自由民主立场而贬低他,也不像更后来那样因同样的原因而抬高他,既不无缘挑剔,也不过分溢美。这时期的批评是冷静的,客观的,充满科学精神的批评,真正的艺术的或学术的批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过高还是过低,都追求客观,崇尚科学,忠实于个人的阅读感受。也许有些批评与对象差距太大,但这是认识问题,很少杂质介入。正是由于这种批评精神的作用,所以,其三,虽然是浅层面的感觉式的,但研究者却敏锐地发现了许多被后来的

研究证明是有价值的话题,如老舍的创作与狄更斯、劳莱、哈代的关系,与鲁迅以及《儒林外史》等清末谴责小说的关系,老舍创作的幽默风格,地域特色,语言艺术……,这些话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成果,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篇。倘老舍研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深入发展,不论对老舍创作还是对这一学科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正当老舍研究即将铺开并深入发展之际,中国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时期。既改变了研究对象的生活和创作、思想和感情,也改变了研究者对他的认识以及认识方式、认识角度、价值标准等等。于是,研究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章 缓慢的伸延

(1938—1949)

第二阶段的老舍研究始于1937年，止于1949年。（这种划分似乎有攀附中国现代史之嫌，但只能如此。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暨作家创作及评论家的评论都与那时代的历史发展密切交织在一起，现代历史发展及其阶段决定着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发展及阶段，因此，这种划分，既是“攀附”，也符合老舍研究的实际。）从老舍研究的进程看，这该是发展阶段，也是从三十年代向五、六十年代过渡的中介。中介研究非同小可。关系到前一阶段提出的课题能否深入，所形成的风气能否发扬光大，也关系到后一阶段的研究在什么基础上怎样进行等问题。但由于历史提供的是一个特殊际遇，塑造的是特殊形象，研究也向着特殊的方面发展——没有承袭三十年代的研究风气和批评精神，也没有在原来基础上深入进行，而是根据需要，铺开了新的课题，——新的，既是研究对象提供的，也是根据时代需要提出来的；需要，自此开始，大踏步走进老舍研究。

首先提到的是对《骆驼祥子》的评论。《骆驼祥子》是第一阶段的产物，但“生不逢时”，没载完就开始了抗战，因而1937年以前，只有叶圣陶的短文《北平的洋车夫》出现。这阶段的研究也远没展开。十几年时间发表不到10篇文章，与作品那巨大艺术成就很不相称。学术研究自然不能以论文数量的多少衡估，但量的稀少毕竟